

錢穆《學籥》之衍義

美和技術學院通識中心教授

楊錦富

一、研究動機

晚近學人，言碩學博彥者，當推錢穆。錢穆為學，歸本多方，而一本於儒，雖遇時代飄搖，始終不失其學人本色，在今歐化急遽的潮流裡，先生確是一位高瞻且令人景仰的前輩睿哲。

錢穆先生一生著述甚多，依汪學群所列《著述年表》¹，自民國七（1918）年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的《論語文解》始，迄民國八十三（1994）年台北聯經出版公司的《錢賓四先生全集》，六、七十年之間，所寫不下千萬字，其著作之精，用心之審，在今之學人中，是少有匹敵的。

先生雖本於儒，然非一定樹立門派。其研史學，而融儒於史，因此，雖言歷史，確非純為敘述之史，乃是深具哲思的文化之史，所以如僅稱說錢穆為史學者，到底不能盡了先生博大淵深的立意，如以文化史學者稱之，必較能盡先生高明中庸的儒家慧命。

民國七十九（1990）年錢穆逝世之後，學界亦在爭議先生與同時的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諸先生，是否即為新儒家的表徵，有如余英時的《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中國現代學術》²《錢穆與新儒家》一文，首列先生與熊十力、賀麟等為新儒家，亦肯定先生在新儒學的地位。然如以事實論，先生恐未全然與熊、賀等並列，其因有二：一以錢穆雖崇儒學，但非僅於義理上發展，於考證之學仍覃研不輟；二以錢穆與熊十力雖為論學之友，然論學多有未合。再以民國四十七（1958）年元旦，張、唐、牟、徐四先生在香港《民主評論》發表《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的宣言，亦邀約錢穆簽署，但為錢穆所拒，等等。以是知先生學無門戶之見，亦未嘗存立宗立派的想法，其治學蓋以史學出發，依史識史觀研究史學，而從其中覘見古書大體、古賢心慧，且從傳統文化中為現代學者敲開一條門徑。因此，謂先生為史學的先進乃可，而必以為新儒家或哲學者流，在理論上，則似有所未當。

而錢穆之言史，是把歷史與文化相結合，亦即把歷史當作文化來研究，所以言述的歷史非史料的歷史，乃是蘊寓文化的歷史，範疇和其他研史者相比，即較深較廣，較能深入學術思想史的領域。

對史學的思想是如此深沉，由史學而衍的文化意識更是深邃。錢穆以為僅僅止於史的識見，宏觀的層面或猶未及，推而之於國學範疇，影響所及必更長遠，故其生前念茲在茲者，即繫念中華傳統文化的如何推闡，先生以為文化得所悠

¹ 汪學群《錢穆學術思想評傳》附錄，頁 305-310。

² 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頁 54-65。

揚，民族才有信心；民族信心堅強，於國際天地才能揚眉軒昂而婆娑奮進，而此立基的工作，又需從青年學子對文化之體認著根，曾計劃將其著作規類編為「小論叢」，便利青年學子閱讀，而興發傳統文化的嚮往。

雖先生已人天永隔，然其哲慧則永不衰微，如薪材的燃盡，火之炎燒而傳承不絕。是以〈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即遵先生遺意，將先生著作分類選輯，以《聯經出版公司》的《全集》為底本，重新排版，名之為《中國學術小叢書》，所舉則《國學概論》、《中國學術通義》、《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學籥》、《學術思想遺稿》、《經學大義》等六書，六書之義，即依學術宏遠與微觀的旨趣論為學之要，而溯其源頭，都是先生對文化史學的通盤理解有以致之的。

今以《國學概論》言，是書乃先生早年任教中學時所編的講義，民國二十（1931）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四十五（1956）年，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

再以《中國學術通義》言，是書乃民國六十四（1975）年春，先生將其三十年所撰論文，就經、史、子、集四部，求其會通和合，攸關中國傳統學之獨特性者，彙綴成篇，是書共收十二篇論文。六十四（1975）年九月，由台北學生書局初版。七十三（1984）年三版時，又增論文兩篇，全書計十四篇。

次以《現代中國學術論衡》言，是書乃先生繼《中國學術通義》之作，續撰此篇。一遵當前各門新學術，分門別類，有所鑽研，其意則學在「通」不在「別」，必以回復中國以往的舊學。全書分十二目，計二十六篇，民國七十三（1984）年，由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

再以《學術思想遺稿》言，是書為講堂記錄稿，計分二部份，其一：為民國三十五（1946）年，先生在昆明五華書院所作《中國思想史》一系列講稿中之最先六講。其二：為先生流亡香港時，應香港大學校外課程之邀，所講《中國學術思想史》中三時段的講稿；計民國四十八（1959）年《明清學術思想》六講，五十（1961）年《秦漢學術思想》六講，五十一（1962）年《先秦學術思想》六講。此十八講，因當年授業學生筆記交新亞書院《雙周刊》發表，次序稍亂耳。

次以《經學大要》，是書乃民國六十三（1974）年至翌年暑，先生為中國文化學院（文化大學）研究生所開「經學大要」課程的講堂記錄稿。先生開此課，即因民國十九（1920）年，撰《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在《燕京學報》發表。於北平各大學開設有「經學史」及「經學通論」課，主康有為「今文家」言，為其他學者譏評，課遂於是年秋後停開，迄今未能恢復，先生引以為疚。

至《學籥》一書，乃先生輯其早年所撰有關開示學者以治學之門徑與方法者，凡六篇，於民國四十七（1958）年，自印於香港。八十六（1997）年重刊此書，乃秉先生原意，將《本論語論孔子》一篇移入《孔子與論語》書，又增入五十（1961）年至五十二（1963）年，先生為香港新亞研究所諸生所講，關於治學門徑方法文稿七篇，全書共十二篇。³ 上列所述，自《國學概論》迄《學籥》成書經過，為摘自錢穆〈素書樓文教基金會〉的出版說明，雖目為說明，言書之序論亦無不可。而僅此數書，即見錢穆殷殷啓領後學的雅意，蓋此數書者，皆從學之本源入手，由本源而透入國學的深處，進之識見傳統文化的大源大本，是先生的照料後學的

³ 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出版說明。

用心，當如日星的朗耀而光芒四射。

二、學籥撰作的動機

錢穆之學，雖為文化的史學，然學的根本，仍從基礎積累而起，無基礎，所言所述當如天馬行空，終必由空而墜。尤以治學言理，不知文化根本何在，即放言侈論，謂天下學脈皆在我身，皆由我出，必如癡人夢臆，終究遺笑大方。所以為學，初起之時，基礎一定要穩要實，如此循序以進，後來的路才能披其荊斬其棘，否則不但荊棘不得披，甚至落於恍惚茫然之況，就不免倒本為末了。

至於為學之路，錢穆總是以己為例，言述學之不易，而其用心，仍時刻不忘對後學的殷切提撕，如自序所言：「自念少孤失學，年十八，即抗顏為人。蟄居窮鄉，日夜與學校諸童同其起居食息。常以晨昏，私窺古人陳編。既無師友指點，亦不知所謂為學之門徑與方法。冥索逾十載，始稍稍知古人學術源流，並其淺深高下是非得失。然僅以存之胸懷間，亦未敢輕有所論述也。嗣後稍有撰著，而終不敢輕談門徑方法。良以人之為學，才性既不同，機緣復互異，從入之道，難可一致。自審所窺有限，豈宜妄有主張，轉滋貽誤。」又言：「頃年踰六十，少壯所志，十不償一；精力就衰，殆不能更有所深涉。而廁身師席，亦垂五十寒暑矣。平生微尚，所拳拳服膺，自以謂是者，舉以告人，義亦宜然。」則平生微尚，拳拳服膺，以謂是語，舉以告人，簡要數句，即說出先生治學的微意所在。

而在治學的基礎上，錢穆則舉《學籥》篇章為說，以為從覃研尼山（孔子）、考亭（朱熹）入手，較能得學的契機；且以登山為例，謂登東山以小魯，登泰山以小天下，都在由小及大，由近及遠，有如《中庸》所言：「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者，卑是低，邇是近，由低處近處著眼，學即能順序以進，而有所得。是以《略論孔學大體》一章，先生即以「孔子博學而能一貫」⁴以概之；而在《朱子學提綱》一書中，先生則謂「凡朱子之所以為朱子，其成學之經過，比較可以具體而詳盡，并有據而可證。」⁵（錢穆《朱子學提綱》頁2）意謂朱子之學，可得而學之，若孔子的博學一貫，則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欲多識孔子之學，仍須德慧渾然者，才能進入其境。因之，在《學籥》篇章佈局上，第一章為《略論孔學大體》，二、三章則分述《朱子讀書法》（是篇作於民國四十四（1955）年十月）、《朱子與校堪學》（是篇作於民國四十五（1956）年二月），蓋以孔、朱並舉，一在春秋，一在南宋，先生之意，孟子之後，承孔門儒術者，乃為朱子。所謂「自有朱子，而儒學益臻光昌；自有朱子，而儒學幾成獨尊。」⁶可謂推崇輩至。

若第四章則為《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是篇作於民國二十四（1935）年十一月。）所學清儒依序為陳澧、曾國藩、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等五先生，所引篇章其實即本書的重心，以此論述，亦能覘見清嘉慶（仁宗顥琰 1796-1820）至光緒（德宗戴滌 1875-1908）百年間儒者治學之況。而第五章言《學術與心術》（是篇作於民國四十四（1955）年三月）則列全書之篇末。其後之六至十二章，

⁴ 錢穆《學籥》頁3。

⁵ 錢穆《朱子學提綱》頁2。

⁶ 同上。

言《學問之入與出》、《推尋與會通》、《談當前學風之弊》、《歷史與地理》、《我如何研究中國古史地名》、《李源澄秦漢史序》、《古史撫實序》諸篇，即如前述，為民國五十（1961）年至五十二（1963）年，先生為香港新亞書院研究所諸生所講之治學門徑及方法，視為增附乃可。是以就大體言，自陳澧迄梁啟超之《論讀書》實即《學籥》的要旨，而此諸先生治學，當非全然顯現清儒為學的方向，惟錢穆特予臚舉，不自乾隆伊始，而自嘉慶以後，蓋為承學者「乾嘉」，又不全囿於「乾嘉」，此又見先生治學之微意。

至若撰作動機，則如先生自云：「每一時代的學者，必有許多對後學指示讀書門徑和指導讀書方法的話。循此推尋，不僅使我們可以知道許多學術上的門徑和方法，而且各時代學術的精神、路向和風氣之不同，亦可藉此窺見。」⁷不同時代有不同學術精神，路向亦有異，擇其所近，取其要者，雖未窺得全豹，亦能見得一斑，而其人物，錢穆則以為百年之間，為「自陳澧始」。

三、陳澧的治學

謂陳澧者，錢穆《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有〈陳澧〉簡介，所敘未多，然能切中肯綮，如：

陳澧在他十歲時，始應學海堂季課，而阮元已調雲貴。然陳澧早年，因此受到很深的乾嘉考證學之影響與薰陶。他後來所著書，如《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聲律通義》，《切韻考》等，都還遵守著乾嘉經學正統派的矩矱。然而時代的劇變，鴉片戰爭，洪楊起事，以及英法侵入廣東，種種驚心動魄，使他漸漸地轉換他學術的路徑。⁸

而嚴文郁《清儒列傳》亦有〈陳澧〉的綜述，姑為董理言述：

陳澧，別名蘭甫、東塾、江南倦客。廣東番禺人，生於嘉慶十五（1810）年，光緒八（1882）年卒。為道光十二（1832）年之舉人。九歲能為詩文。及長，凡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小學無不研究。中年讀諸經注疏、子史及朱子書，日有課程。六應禮部試未第，任河源縣訓導，到官兩月即告歸。為學海堂學長，歷數十年。晚主講菊坡精舍，以經史實學教士，勉諸生篤行立品，成就甚眾。光緒七（1881）年疆吏疏陳「耆年碩德」，請加褒異，詔嘉其學行純篤，足以矜式士林，以五品卿銜。

又云

自阮元（文達）治粵，提倡學術，人才蔚興，先生後起，尤為大師。兼以鄭君朱子宗，主通漢宋之郵，意在補偏求敝，不為無益無用之學，其宗旨特為

⁷ 錢穆《學籥》頁 63。

⁸ 同上。

醇正。⁹

所作甚多，而以《東塾讀書記》二十五卷最著。「傳」則見徐世昌等編《清儒學案》一七四卷之一，繆詮孫《續碑傳集》七十四卷及《清代名人傳略》（英文版）九十卷。

以錢穆《簡介》所云，陳澧早年深受乾嘉考證學的影響與薰陶，後因時代劇變而漸漸轉換學術路徑；及嚴郁文《清儒學案》綜輯所謂，陳澧兼鄭玄、朱子之學，主通漢、宋，而在補偏救弊云云，則陳澧治學已能取乾嘉而有所變異。

論及陳澧所作，其最著者，厥為《東塾讀書記》，《讀書記》為札記體裁¹⁰，載〈東塾讀書記序〉云：「澧性好讀書，於天下事惟知此而已。讀書有所得則記之，有所論則記之，積久成編，其有益於天下之讀乎，不得而知也。敬慕亭林先生《日知錄》，然此所記惟讀書之事，不敢竊比也。有及於讀書之外，謂之餘記。東塾者，余家東偏，有一書塾，澧數十年讀書處也。」則是書為隨筆札記可知。），書凡二十五卷，蘭甫先生生前，僅刻成十五卷，餘則未定之稿本十卷，先生遺命，名曰《東塾雜俎》¹¹，先生歿後，因循未刊，迨及民國三十二（1943）年，歲次癸未，合肥王揖唐、紹興周肇祥等，始刊成於北平古學院中，列為《敬躋堂叢書》之一，《東塾雜俎》一書，至是方獲流傳於世。¹²論其篇目，則《東塾讀書記》預定撰成爲二十五卷，其卷一至卷十二，分別記述《孝經》、《論語》、《孟子》、《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三傳》、小學、諸子，卷十五鄭學，卷十六三國，卷二十一朱子，凡上已刻成者共十五卷，其餘未刊成者，計有卷十三西漢，卷十四東漢，卷十七晉，卷十八南北朝隋，卷十九唐五代，卷二十宋，卷二十二遼金元，卷二十三明，卷二十四國朝，卷二十五通論，共爲十卷。

而古學院所刊《東塾雜俎》，共分爲十四卷，其卷一西漢，卷二東漢，卷三晉，卷四南北朝隋，卷五唐五代，卷七宋，卷九遼金元，卷十明，卷十一國朝，卷十二通論，此十卷者，即陳澧《東塾讀書記》中原列目錄所有，而迄未刊成者，其餘卷六唐疏，卷八南宋，卷十三餘錄，卷十四瑣記，則係《東塾讀書記》中原列目錄所未嘗見及者。至若言其治學，則其要義，乃爲：

（一）漢宋兼顧，無有偏倚

蓋以清之學術標榜漢學，與宋之理學，相爲峙立，如此爲學，略有偏執。陳澧則以爲峻門戶，標宗旨，又何得於學術之源？故於漢宋學術，力主調和，且於漢儒之中，致力表章鄭玄義理之言；於宋儒之中，致力表章朱子訓詁之論，其意必如此，方足以得會通之郵。故錢穆引陳澧云：

漢儒善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譏漢講訓詁而不及義理，非也。近儒尊崇漢學，發明訓詁，而不講義理，亦非也。

⁹ 參見嚴文郁《清儒列傳》頁 214。

¹⁰ 陳澧《東塾續集》頁 61。

¹¹ 汪宗衍《陳蘭甫先生年譜》。

¹² 參見胡楚生《清代學術史續編》〈東塾雜俎〉書后，頁 57。

又言：

竊冀後之君子，祛門戶之偏見，誦先儒之遺言，有益於身，有用於世，是區區之志。¹³

讀書本在博聞廣識，增益己志，如一以門戶為念，或強訓詁，或重義理，彼此互為爭伐，其問學之意必落於下策，往後又何能立人達人？不能立人達人，只在爭訓詁、義理，則學無次第，心志搖動昏眩，如何箇學！是以求「有益於身」，「有志於世」，纔能堂堂正正，無有罣礙，否則心存壁壘，猶若築牆防衛，防人太過，己反不安，此雖考據家通病，亦門戶之見過深者之缺。故陳澧以漢、宋兼采，不為偏顧，於乾嘉倡言之際，可謂卓智。而類若此些言語，《東塾雜俎》亦時有所見，如：

前明尊宋儒而盡棄漢唐注疏，近儒尊漢學而盡棄程朱之書，皆非所以求道真、廣異義也。（陳澧《東塾雜俎》卷2）

又如：

近人謂宋儒講義理，譏漢儒不講義理，此未見漢宋人書者也。宋人有文集有語錄，漢人不但無語錄，並無文集，其講義理，唯在注經耳。¹⁴

又如：

《禮記正義·序》云：「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文證義理二者，《孔疏》不偏廢也。宋儒但說義理，近儒但取文證，皆偏也。¹⁵

則陳澧之究學，不取門戶爭勝之說，可為後學借鑑。尤以早年讀漢儒書，中年讀宋儒書，晚年論學，乃折中二者，其調和訓詁與大義之間，無所偏執，是會通漢宋學術者。

（二）讀書須徹頭徹尾，直攻難處

讀書非學風尚，風尚為一時，讀書為終久；僅讀一點小書，便說衡量全局，未免瞎子摸象，而以偏蓋全。其次，讀書得專一，宜擇己性近而學之，隨當時「顯學」而流轉，到底沒了自己的意見，最後總是茫然一片。尤其閱讀經書，宜耐性看去，不要看一些就嫌煩，嫌煩慣了，不再理會，則經書還是經書，讀他一輩子，

¹³ 錢穆《學箴》頁64。

¹⁴ 陳澧《東塾雜俎》卷二。

¹⁵ 同上，卷六。

他還是他；再者，讀經亦宜讀注疏，或加圈點，始浮晃的心得所安定，亦是治心的不二法門。如：

為學以治經為本，治經以注疏為先，疏雖近煩，而學者讀之，正可藥其不耐煩之病，故余告學者，總以圈點注疏為功課，此即治心之法，此即求放心也，學問與心性合而為一者也。（同上，卷6）

有如孟子所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舉凡天地間任何學問，壹惟專心，乃有所得；而專心之要，在收其放逸的心，否則如平原走馬，如何能回頭！且以治經言，注疏煩瑣，人皆以為病，陳澧則以為必得如此，纔能收束紛亂的心，學纔有益，未經此過程，一下子要通經達道，豈是容易。故同篇亦云：

《學記》「君子之於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正義》曰：「君子之人，為學之法，恆使學不離身，藏謂心當懷抱學業也，修謂修習不能廢也，息謂作事倦怠之時，而亦在學也。游謂閒暇無事游行之時，而亦在於學，言君子於學，無時暫替也。」《論語》「時習」，朱子以為「時時習之」即此意。謝上蔡云：「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不及此《疏》之醇實也。

是「藏修息游」，在學不離身且日日積學，學如離身，便無從得學。所以學須徹頭徹尾，讀經讀注疏，皆得如此，如只是口誦，心不在焉，還是未讀。

（三）博學知服，尚友賢達

陳澧「博學以知服」的話，是得之王鳴盛。（王鳴盛（1722-1797）《十七史商榷》）

王西莊云：「大凡人學問精實者必謙退，虛偽者必驕矜。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為功，其情最可惡。此所謂博學以知服。」¹⁶

所謂「精實者必謙退，虛偽者必驕矜」。於學者言，不啻一針見血之論。大凡學優的佳士，其學必謙，為人亦客氣。所謂「謙謙君子，卑以自牧」。此即「博學以知服」之意。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則情亦足惡。此例如毛奇齡《喪禮吾說篇》，《四庫全書總目》謂「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奇齡說經，好立異議，而顛舛乖謬，則莫過於是書。大旨以子夏《喪服傳》為戰國以後人偽作，故逐條攻擊，務反其說，其叛經之尤者，如謂喪服有齊衰無斬衰。…至謂本生父母不當降在期服，傳重者不必嫡孫，則不特叛經，且背律矣。豈非特其博洽，違心巧辨矣（《四庫全書總目》卷23 經部 禮類存目一 頁190）」。¹⁶可為一證。

至如崇尚古賢明達，則陳澧所重唯在「忠誠」、「氣節」二者。故於宋則范仲淹，於明則方孝儒，於清則顧炎武。其言范仲淹謂：

¹⁶ 錢穆《學篇》頁69

范文正公自言，但「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范仲淹〈上資政晏侍郎書〉）。文正之學，蓋盡於此四語。¹⁷

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行，在其不疑；上誠於君，下誠於民，在其敦篤，則知必為忠誠之人。又言方孝孺：

明人學問文章，至元末而已衰，得方正學以氣節振之，一代忠臣烈士，接踵而出，論明儒者，當以方正學為第一。

又云：

朱竹垞《黃先生遺文序》云：「講學莫盛于宋，然汴京臨安之陷，諸臣以身殉國者不數見。至於明，死靖難則有若方公孝孺，死閹黨則有高公樊龍，而山陰劉公宗周，潭浦黃公道周。與先生後先，自靖咸以道學兼忠節，即宋儒未有逮焉。」明儒之卓越千古者，竹垞此數語盡之，真千古定論也。¹⁸

士大夫敦尚氣節，東漢以後，唯明代最盛。而方孝孺的堅守節義，以正學為己任，於義利之辨，始終秉持操守，俯仰無愧乎聖賢，是以陳澧極力為之表彰，典型夙昔，有值景仰。又言顧炎武，謂：

顧亭林云：「愚所謂聖人之道者，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又云：「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污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之事。」澧案勸學即博學於文也，獎廉即行己有恥也。竊嘗論之，《論語》第一句「學而時習之」，即博學於文之初基也；《孟子》第一句「何必曰利」，即行己有恥之要道也。亭林之言，與《論語》、《孟子》，若合符節也。¹⁹

勸學即博學於文，獎廉即行己有恥。前者為「有益於身」，後者為「有用於世」；前者顧炎武所倡，後者陳澧所遵循，則陳澧之欽慕顧氏，學行亦崇顧氏，所效則在經世致用，此胡楚生亦推尊謂：「亭林先生入清以後，即未嘗出仕，然其為學，秉通儒之才，求經世致用，是以朝章國典，古今治亂，莫不元元本本，爛熟胸中，是以所論治道，皆能親切得理，措諸施政，亦可起而立行，非迂論也。」（胡楚生《清代學術史研究續編》頁67），而其歸結，則謂：「蘭甫先生於歷代大儒之中，其瓣香膜拜者，恐仍以亭林先生為第一人也。」（同上，67-68）而在錢穆言，則尤以為顧氏之學，之所以深為陳澧所喜，其勸學獎廉者，更在求心術之正，有如陳澧所云：

孟子論天下一治一亂曰，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顧亭林之言足以暢其旨。

¹⁷ 陳澧《東塾雜俎》卷七。

¹⁸ 同上，卷十。

¹⁹ 同上，卷十一。

其言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為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²⁰

以是知《東塾雜俎》、《東塾讀書記》所以擬范仲淹、方孝孺、乃至顧炎武，而云氣節也者，意亦欲轉移人心，而為學之道，讀經讀注疏，其意則又在心術，此即陳澧論學的微旨，亦錢穆撰文之意。

然平心而論，如以今識古，陳澧論學仍有或多或少的缺失。以考據、義理兼之相觀，其《東塾雜俎》較乾嘉專務訓詁考據者流，實有過之。從時代背景言，書中所論，究竟還不脫當時經學氛圍，雖踵武顧炎武等諸賢，但《雜俎》所載，仍著意於經學，是學雖漢宋相兼，實則尚偏漢學，故教人靜心讀經讀注疏，仍期於經學紮功夫，是尚無法脫去舊學，而自創新意，故論學有寓微旨，其為當時讀書人共同標的，猶為可知。且其書為札記文體，雖依經史分類，仍散列其日記、隨筆及未刻之稿，如弓之有弦，其弦有餘音，卻引而不發，不足發聾震聵。以是陳氏身後，僅《讀書記》、《雜俎》傳世，亦未見開新面目、新風氣，此陳澧仍不出乾嘉訓詁考據的積習，如錢穆所言「陳氏在學術思想史上還不夠做成一個畫界線的人物」。²¹無論如何，在承前賢的思想，陳澧所見讀書人的「懶與躁」，是心術的通病，其深深以為誠者，尤可為後學的借鑑。

四、曾國藩的治學

論及曾國藩，錢穆《學籥》開宗明義即言：「治近百年史的，論到人物方面，無論如何，不能不首先推到曾國藩。曾氏氣魄之雄厚，人格之偉大，及其在政治上、社會上種種之建立，其不可磨滅處，縱然近人有好持異論的，到底也不能不承認。至論學術，曾氏也有他自己一套獨特之旗幟與地位。述說近百年來之諸儒讀書論，曾氏是極可注意的一人。²²是陳澧之後，錢穆舉曾氏為論，殆非無因。

如以曾國藩小傳言，則嚴郁文《清儒列傳》所述，可以概括：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諡文正，湖南湘鄉人。嘉慶十六（辛未 1811）年生，同治十一（壬申 1872）年卒。

道光十八（戊戌 1838）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兩遇大考，列高等，六遷禮部侍郎。會洪楊事起，在籍督辦團練，遂編製鄉勇，連復沿江各省，封毅勇侯，為同治中興功臣第一。同治七（1868）年，拜武英殿大學士，九（1870）年，調督兩江，以目疾乞休。卒贈太傅。

有清中葉，漢學盛而宋學衰，先生力挽其弊，以宋儒程朱之學為根本，兼研訓詁名物典章，於漢家言亦窮其頤而擷其英，致諸實用。乘時得位，戡定大亂，光佐中興，其勳業所就，視明之王文成（守仁）超越倍蓰，真儒實效，

²⁰ 陳澧《東塾讀書記》卷三。

²¹ 錢穆《學籥》頁 72。

²² 同上，頁 73

蓋聞氣所鍾也。²³

若《清儒學案》卷一七七之一，《續碑志傳》卷五，《清代名人傳略》第七五一，皆有先生傳略，可以見之。所作《曾文正公全集》一百六十卷，則一生精力之匯萃，得以名世。至論學者，則《求闕齋讀書錄》十卷、《求闕齋日記鈔》二卷，乃見奧義。至於學之脈絡，當如錢穆《清儒學案序目》所言，文宗桐城姚氏（鼐），訓詁尊高郵王氏（念孫），經學考據則師昆山顧氏（炎武）、金匱秦氏（蕙田），窮蹟擷精，海涵地負。其在京城，常從唐鏡海（鑑）、倭艮峰（仁）諸人遊。然不拘拘為講學家言。嘗自謂「欲以禹、墨為體，老、莊為用」。雖非從容中道，亦庶幾矣。²⁴

至綜其論學要旨，則守約、務廣需得兼之。

（一）守約而專，務在持恆

錢穆言曾國藩讀書要訣，在一「約」字，此數見《家書》、《家訓》中。如云：

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鶩。讀經以研尋義理為本，考據名物為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為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則窮理，史則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²⁵

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鶩，此是約之事，亦是專之事。今日讀一經，明日讀一經，心已旁鶩，浮晃不定，就是讀他十三經，經之義仍無從得。讀經如此，讀史亦然。然讀經在窮理，讀史則在考事，窮理在一句一句讀去，今日不通，明日求通，總要耐下性子讀下去，雖然枯燥無聊，久之，乃可通。若初讀時，即貪多務得，要人稱讚，到底是一浮誇，那是過眼煙雲，必存之不久；至於讀史，當用故事看待，想見其中人物，恍如親身其事，久之，此歷史人物亦必照映在心中。是讀經讀史雖有別，守約而專，乃為必要。終其結果，則在一耐字。此曾氏教人之道，亦親身實踐者。相近之例，如：

經則專首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若經史之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聞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為篇意間，除《昌黎集》外，更無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聖人復起，

²³ 嚴文郁《清儒列傳》頁 232。

²⁴ 錢穆《中國思想史論叢·八》頁 617。

²⁵ 曾國藩《曾文正公家書》（道光二十年正月）。

必從吾言矣。²⁶（同上）

又云：

讀背誦之書不必多，十葉（頁）可耳。看涉獵之書不必多，亦十葉（頁）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換他部，此萬萬不易之道。阿兄數千里外教爾，僅此一語。²⁷

此即曾國藩「守約」的讀書法，而此法曾氏始終堅確自信，迄老不變，且與當時博雅考訂之學務廣而匏圖吞棗者迥異。因之，後來用於行軍的「耐」、「恆」、「拙」、「誠」及言「識」、「紮硬寨，打死仗」的口號及成功的訣竅，與其讀書精神實脈絡相通。²⁸而類此言語，其《家書》亦屢屢可見。如所云：

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者缺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以驟幾；至於有志有恆，則諸弟勉之而已！²⁹

又云：

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則博觀他塗，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³⁰。

以是知，心如不專，則求師不專，求友不專，問學之路，即易見異思遷，所謂「此眩彼奪」，博愛而不親，必無法擴其閱識，曾氏教人蓋有深意。

（二）讀書為己，務乎其大

錢穆以為曾氏所言「讀書既主守約，則選擇不可不審」。是以提出自韓、柳之作，及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論述，甚至《四書》、《五經》之外，尤應讀《史記》、《漢書》、《莊子》及《通鑑》、《文選》、《古文辭類纂》、《十八家詩鈔》諸作，視為選書的要義，之外，亦以為讀書應「先務乎其大」。

然如以守約推之，則選書之外，讀書之義，則仍為己，而非為人，此點錢穆必已言之，惟未鮮明耳。今略補之，如：

²⁶ 曾國藩《曾文正公家書》（道光二十年正）。

²⁷ 同上，道年四年三月

²⁸ 錢穆《學籥》頁 78

²⁹ 曾國藩《曾文正公家書》（道光二十一年閏三月日記）

³⁰ 同上，（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致四位弟）、

凡讀書有為人為己之分；為人者，縱有心得，亦已的然日亡。予於杜詩，不無一隙之見，而批點之時，自省良有為人之念；雖欲蘊蓄而有味，得乎？（同上）

讀書在為己，為己在內；言為人，已在外，在外則不免功利枷鎖，縱有心得，隨俗而流，的然日亡，已可預知。讀杜詩讀他文，莫或如此，一存為人之念，便已落下乘，如何而能蘊蓄有味！推之於博學考證者，亦莫如是觀。此曾氏日記有云：

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閎儒碩士；而其中為人者多，為己者少。如顧閻並稱，顧則為己，閻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江戴並稱，江則為己，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段王並稱，王則為己，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方劉姚並稱，方姚為己，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其達而在上，李厚庵、秦味經則為己之數多，紀曉嵐、阮芸台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中，先將為己為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而自鬯茂者也！³¹

曾氏於有清之朝，其達士博彥，為己為人，各舉例以言；為己者，經學者如顧炎武、江永、王念孫；文學者如方苞、姚鼐；達士則李光地、秦蕙田。而為人者，經學者如閻若璩、戴震、段玉裁；文學者如劉大櫆；達士如紀昀、阮元。此雖個人之論，亦不無道理。蓋為人者，通常露才揚己，故其內斂處即少；為己者，蘊藉敦篤，學能端雅，有如植樹栽種，為己者，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根深而葉茂；為人者，雖一時高倡旗幟，終亦不足，此二者之別，而曾氏已曉之於胸矣。

次者，讀書亦在「先務乎其大」。務乎其大，則小者不能躲。是以擇書要慎選，要有次第。此中意見，曾氏《聖哲畫像記》所述最明：

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眾，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為言。如文王、周公、孔、孟之聖，左、莊、班、馬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諸葛亮）、陸（贄）、范（仲淹）、馬（司馬遷），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朱、張，在聖門則德行之刻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佑）、馬（端臨）、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引之父子），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為近，姚、王於許、鄭為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

³¹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咸豐八年十一月日記）

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為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其中如「顧、秦於杜、馬近，姚、王於許鄭為近。皆考據也」。以曾氏家書言，多有不取考據的言論，而《家訓》中則主採考據訓詁之長，此是曾氏學之增益處。而據考據淵源，分杜馬、許鄭為兩派，以顧秦接杜馬，以二王接許鄭，放大考據範圍，較之乾嘉諸儒實有過之。

（三）獨鍾王氏，得其理義

曾國藩嘗從唐鑑（鏡海）聞義理，又私淑於姚姬傳（鼐）學古文法，然其言義理文章，論及識解理境，則超出唐、姚二人之上。如云：

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大抵陽剛者，氣勢浩翰；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翰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類言之：論著類，詞賦類，宜噴薄；序跋類，宜吞吐；奏議類，哀祭類，宜噴薄；詔令類，書牘類，宜吞吐；傳誌類，敘記類，宜噴薄；典志類、雜記類，宜吞吐。其一類中，微有區別者：如哀祭類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詔另類宜吞吐，而檄文則宜噴薄，書牘類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噴薄；此外各類，皆可以是意推之。³²

就文章之道言，姚氏分文章為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意本即混淆，而曾氏又言陽剛者，即浩翰；浩翰者，即噴薄；又言陰柔者，即深美；深美者，即吐出。此為就姚氏意引申，然則何謂噴薄，何謂吐出，則未得其解。此莫非所謂「造境」之說，而此造境，無以名之，名之為「只可意會，不得言傳」可也，就現代語法言，稱為「語言的弔詭」或得其解。正如曾氏〈同治二年九月日記〉所云：「文章陽剛之美，莫要於慎勇直怪四字。陰柔之美，莫要於憂孤遠潔四字。惜余知其意，而不能竟其學」。然則「知其意，而不能竟其學」大抵為曾氏對陽剛、陰柔二詞的詮釋。曾氏如此，他人可想而知。惟無論如何，就文章體用論而言，曾氏識見較姚氏為過之，應為當然。

再以經學言之，則清儒之中，曾國藩除推許顧炎武外，乾嘉學人，尤推贊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錢穆《學籥》曾引〈咸豐九年四月〉曾氏日記所謂「本朝善讀書，於最好高郵王氏父子」。惟未加闡釋，只以「守約」概之，此說本文上列以引用，不擬再敘。即錢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曾滌生〉章，所舉〈曾氏之禮論〉，列〈曾氏對漢家之箴貶〉、〈曾氏之會通漢宋論〉及〈許鄭與杜馬〉之說³³，皆有所辨議，對高郵王氏父子則獨缺，此或先生較偏宋學之故。然曾氏之所以獨好王氏父子，非無他因，壹在王氏父子之能反映乾嘉學術的特色。其例如所云：

³²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咸豐十年日記）。

³³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頁 583-587

所論懷祖（王念孫）先生父子解經，什九著意於假借字；本朝諸儒，其祕要多在此，不獨王氏為然。³⁴

又云：

朱彬《經傳考證》，其《訓詁考證》，亦與王伯申（引之）先生相仿；其言《書經》大自多語助辭，則前人所未發也。³⁵（同上，〈咸豐九年五月日記〉）

又云：

高郵王懷祖先生父子經學，為本朝之冠，皆自劄記得來；吾雖不及懷祖先生，而望爾為伯申甚切也！³⁶

又云：

爾問看注疏之法，《書》、《詩》文義奧衍，注疏勉強牽合，二語甚有所見。《左疏》淺近，亦頗不免。國朝如王西莊（鳴盛）、孫淵如（星衍）、江艮庭（聲）皆注尚書；顧亭林（炎武）、惠定宇（棟）、王伯申（引之），皆注《左傳》，皆刻在《皇清經解》中；《書經》則孫注較勝，王江不甚足取；《左傳》則顧、惠、王三家俱精。王（引之）亦有《書經述聞》爾曾看過一次矣。大抵《十三經注疏》，以《三禮》為最善，《詩疏》次之；此外有醇有駁。爾既看動數經，即須立志全看一過，以期作事有恆，不可半途而廢。³⁷

又云：

《經義述聞》，博洽精深，非初學所能看，目下不必看也。看注疏時，有不能解者，偶一緝查，則可耳。³⁸

然則曾氏數取王引之《經義述聞》以教子弟，其意學者須先識字，以此書乃依假借而得正字，非囫圇吞棗者可比。此湯金釗撰〈王文簡墓誌銘〉可知，所謂引之政事之暇，惟以著述為事，侍養石臞先生，討論經義，凡有所得，即筆於篇成《經義述聞》三十二卷，不為鑿空之談，不為墨守之見，聚訟之說則求其是，假借之字則正其解。又以小學之書，皆釋名物實義，若經傳語辭，釋之者無幾，語義未明，經義反因之而晦，爰博考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發明助語古訓，

³⁴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咸豐九年三月十三日致澄沅季三弟）。

³⁵ 同上，（咸豐九年五月日記）。

³⁶ 同上，（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論紀澤）。

³⁷ 同上，（咸豐九年八月十二日論紀澤）。

³⁸ 同上，（咸豐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致澄沅季三弟）。

分字編次，爲《經傳釋辭》十卷，以補《爾雅》、《說文》、《方言》之缺，論者謂有清經術，獨絕千古，高郵王氏一家之學，三世相傳，與長洲惠（棟）氏相埒³⁹云云者，則高郵王氏父子的治經，顯然必具他人所無特色，如僅依上述之論，恐亦無法深入理解。

胡楚生先生稱述王氏父子爲學，即指其最足稱道者，厥有三端：

其一為求真之研究精神，其二為科學之歸納運用，其三為綿密之訓詁方法。蓋皆以古籍校讎訓釋之安雅為其依歸者也。⁴⁰

是「求真」、「歸納」與「訓詁」，爲其方法；古籍校讎訓釋的安雅，爲其依歸，此爲王氏治學之道，亦乾嘉學者常用之法。

進一層說，以皮錫瑞《經學歷史》言，其議論唐人五經正義，以爲其失有三：曰「彼此互異」，曰「曲徇注文」，曰「雜引讖緯」。蓋唐宋義疏之學，即如皮氏所言「注不駁經，疏不駁注，不取異義，專宗一家」⁴¹，不免佞從古人，不敢自出己見。若清之戴段二王之治學，首重「實事求是」，「無徵不信」，所謂「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⁴²，故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凡立一義，必旁徵曲喻，會通全書，而後乃安，此即王引之《經傳釋詞》自序所云：「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雖舊說所無，可以心知其意」。又所謂「故大人之治經也，諸說並列，則求其是，字有假借，則改其讀，熟知漢學之門戶，而不囿於漢學之藩籬者也」。其《經義述聞》自序亦云：「說經者期於得經義而已，前人傳注，不皆合於經，即擇其合於經者從之，其皆不合，則以己意逆經義，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雖別爲之說，亦無不可。」由是知王氏父子之治經，往往「考之文義，參之古音」，「由借字之古音，以考同音之本字」，「以求一心之安，而補前人之闕」。尤有進者，如王念孫《廣雅疏證》序所謂：「詁訓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群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網必挈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故王氏父子於所撰書中，於漢魏古注之錯謬者，皆多所糾訂，即古聖經傳之本文，亦時相訂訛，不加曲徇，甚如業師之說解，有所疑義，亦揭其失⁴³。此者，一以事實爲依據，而以本義爲歸趨，即爲探究道理之真精神，亦治學真正的態度，其爲曾氏所喜，是乃可知。

至於考據學有無缺失，於此，曾氏未嘗講說，錢穆亦隱而不言，其實考據學是有其缺失，然以乾嘉學者，爲官者多，政治因素介入，人亦不願語其非，惟就事實論，以考據之法整理國故則可，用於人生哲理則無益，於科學研究亦有開倒車之嫌，此胡適等以批判之語言說，亦非無因。其《胡適文存》載：

我們的考證學的方法儘管精密，只因為始終不接近實物的材料，只因為始終不曾走上實驗的大路上去，所以我們的三百年最高的成績不過幾部古書的整理，於人生有合益處？於國家的治亂安危有何裨補？雖然做學

³⁹ 《廣雅疏證》引〈王引之傳〉，頁 14。

⁴⁰ 胡楚生《清代學術史研究》〈高郵王氏父校釋古籍之方法與成就〉頁 208。

⁴¹ 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統一的時代〉，頁 215。

⁴² 戴震《戴震文集》〈答鄭丈用牧書〉頁 143。

⁴³ 胡楚生《清代學術史研究》頁 209。

問的人不應該用太狹義的實利主義來評判學術的價值，然而學問若完全拋棄了功用的標準，便會走上很荒謬的路上去，變成枉費精力的廢物。這三百年的考證學固然有一部份可算是有價值的史料整理，但其中絕大的部份卻完全是枉費心思。如講《周易》而推翻王弼，回到漢人的「方士易」；講《詩經》而推翻鄭樵、朱熹，回到漢人的荒謬詩說；講《春秋》而回到兩漢陋儒的微言大義，…這都是開倒車的學術。⁴⁴

是胡適之說，頗具針砭，姑不論其說是否定為人信服，然依懷疑而批判，依批判而頗有微辭，其求學術的歸宿人生塗轍甚明。

今再回顧曾國藩的治學，則如錢穆所言：

蓋雄直倔強，曾氏性格之所長；恬澹閑適，曾氏性格之所短。曾氏研攻詩文，著眼在此兩點上，切就己身，釋回增美。縱使不以詩文名家，而此種研習方法，對於自己性靈修養上，也會有絕大益處。⁴⁵（錢穆《學籥》頁84）

雄直倔強，曾氏性格之長；恬澹閑適，曾氏性格之短。以此治詩文如是，以此治經學亦如是。故就事功與學術論之，曾氏所營造的事功實較學術的探究更為超過。如論家書、家訓，曾氏儼然可為一諄諄長者、亦諄諄儒者，然就學術邃密處言，曾氏似無能如一代大師之為晨鐘暮鼓，揄揚大道，惟此得彼失，此失彼得，欲二者盡均臻至善，又談何容易。

五、結語

錢穆《學籥》〈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所舉為陳澧、曾國藩、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等五先生。限於篇幅，〈衍義〉所舉，僅述陳、曾二先生，若張、康、梁三先生則較缺微，為求整體性，則仍就《學籥》所述，擇要言述三先生的思想，至於深究部份，則待乎他日。

（一）張之洞

錢穆云：

1. 張之洞，嚴格說，算不得是一個合標準的學者，但他的《書目答問》和《勸學篇》，確是代表了當時學術界一種風氣和傾向。⁴⁶
2. 《書目答問》中所舉書共二千餘種。若論卷數，則應在十萬卷上下。分類言之，經、子兩部，都在一萬卷以上，集部幾及兩萬卷，史部則出兩萬卷之外。這樣巨大的書目，只好算是一種簿錄，絕不能作為指導人讀書的門徑。⁴⁷

⁴⁴ 胡適《胡適文存》第三集 第二卷〈治學的方法與材料〉頁153-154。

⁴⁵ 錢穆《學籥》頁84。

⁴⁶ 同上，頁86。

3. 《書目答問》的功效，不啻像在教人去作一種版本目錄的學問，或是做一種校勘收藏的工夫。而在指示人真實做學問的一點上，則可說並無貢獻。⁴⁸
4. 《答問》說：「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又說：「士人博極群書而無用於世，讀書何為？故以經濟一終」。不知清初諸老多講經濟，卻尚不甚重小學；逮及乾、嘉考證學全盛時，方力尊小學，卻又不重經濟。道、咸以下，漸漸又重經濟，而小學卻又漸漸為人淡視。今《答問》不辨此中消息，其教人治學，似乎該由小學始，由經濟終。在他似乎既不知道小學的甘苦，又不知道經濟的艱鉅。對於清初及乾、嘉的學術界，既顧此失彼；即在晚清一派經世致用的新思潮下，亦可謂是不分輕重。⁴⁹
5. 回頭再看他二十四年前的《書目答問》，千百種精校注本，分門別類，儼如七寶樓臺，何等莊嚴！待到《勸學篇》裏，語氣竟如此蕭條；一再的打折扣，只希望人能讀《近思錄》、《東塾讀書記》、《通鑑輯覽》、《通考詳節》偌大的學術門面，到底破壞無遺了。這不能叫「守約」，只能算是「居陋」。⁵⁰
6. 從光緒元（1875）年到光緒二十四（1901）年，中國學術界一般情形之惡化，及其急轉直下之勢，正可於張氏的先後兩書中看出。《答問》刊於四川，《勸學》刊於江蘇，這裏也有一些地域的關係。四川僻在長江上游，還能使當時人發其懷古之幽情。江蘇接近海洋，門戶洞開，風氣鼓盪，便先搖動。因此張之洞在晚清學術史上，雖說沒有他的地位，然而他究已粉墨登場，由他來表演出當時一幕很重要的劇情了。⁵¹

錢穆以揶揄且近似嘲諷的筆法，說述張之洞，他可以講，我們不可以講；他瞭解學術因緣，我們不瞭解學術因緣；因此，在先生帶領下，我們又似乎更清楚看到晚清官宦為求立名，再學術歷程上，所扮演的「居陋」角色的地位。

（二）康有為

錢穆云：

1. 康氏生於清咸豐八（1858）年戊午，距今不到八十年。他正式起來做一種嚴肅的新讀書運動，厥為其三十四歲（189）在廣州長興里萬木草堂之講學，時為光緒十七（1891）年辛卯。⁵²

⁴⁷ 錢穆《學籥》頁 87。

⁴⁸ 同上，頁 88。

⁴⁹ 同上，頁 91。

⁵⁰ 同上，頁 97。

⁵¹ 同上，頁 97。

⁵² 同上，頁 98。

2. 記載康氏萬木草堂講學詳情的，有康氏自著的《長興學記》，及其弟子梁啟超的《南海康先生傳》。《長興學記》是主持講學者當時手定的一種學規，《康先傳》則為當時學者事後追憶的一種講學精神之描寫。⁵³

3. 梁氏說：

先生以為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於教育，乃歸講學於里城。以孔學、佛學、宋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其教旨專在激厲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⁵⁴

4. 至康氏以宋、明學與孔學並重，這已為乾、嘉學者所不肯言；而其以佛學與孔學並重，則又為宋、明學者所不敢言。至云「以孔學、宋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其意似以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哲學對立，亦較近人只認有科學不認有哲學者稍勝一籌。亦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較少毛病。至其宗旨，提出「激厲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項，尤其恰中了清代兩百多年在異族統治下所壓迫成的士大夫意態風氣之痼疾。即以最近二三十年的大學教育言，能做到廣求智慧一項，已遠不易。不僅講文史的只是紙篇字面之學，脫不掉乾、嘉以來訓詁、考據、記誦之積習；即治科，亦還不免如此。在講堂上稗販，豈不仍等如在紙篇上搬弄。至於激厲氣節、發揚精神，此兩項，在主政者固無此意提倡，即掌教者亦少見及其重要。我深感梁氏所記康氏當日萬木草堂一段講學精神，卻實有再受我們今日注意之價值。⁵⁵

5. 長興學舍的課程，分別如下諸目：

志於道：一曰格物。（扞格外物，勿以人欲害天理。）二曰厲節。（提倡後漢、晚明之儒風。）三曰辨惑。（近世聲音訓詁之學，小言破道，足收小學之益，不能冒大道之傳。）四曰慎獨。（劉戡山據為宗旨，以救王學末流。）這裏的第一項，即要復立乾、嘉所推第一流學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裏所要打破的「天理」「人欲」之辨。第三項則是要打破乾、嘉正統派所建立的聲音訓詁學在整個學術系統裏的地位。第二、四項，則可說是康氏講學的骨幹。

據於德：一曰主觀出倪。二曰養心不動。三曰變化氣質。四曰檢攝威儀。

依於仁：一曰敦行孝弟。二曰崇尚任恤。三曰廣宣教惠。四曰同體飢溺。

游於藝：一曰義理之學。（原於孔子，推於宋賢，今但推本於孔子。）二曰經世之學。（今令可行，務通變宜民。）三曰考據之學。（賢者識大，是在高識之士。）四曰詞章之學。⁵⁶

⁵³ 錢穆《學籥》頁 98。

⁵⁴ 同上，頁 98-99。

⁵⁵ 同上，頁 100。

⁵⁶ 同上，頁 102-103。

6. 康氏說：孔子之學，有義理，有世事。宋學本於《論語》，而小戴之《大學》、《中庸》及《孟子》佐之，朱子為之嫡嗣，凡宋、明以來之學，皆其所統，多於義理。漢學則本於《春秋》之《公羊》、《穀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輔之，而以董仲舒為公羊嫡嗣，凡漢學皆其所統，近於經世。義理即德行，世事即政事，言語、文學亦發明此二者。

孔子經世之學在於《春秋》，凡兩漢四百年，政事學術皆法焉。非如近世言經學者，僅為士大夫口耳簡畢之用，朝廷之施行，概乎不相聞也。

今與二三子通漢、宋之故，而一歸於孔子，譬如導水自江河，則南北條皆可正。…這是康氏的學術史觀。漢儒經世，宋儒義理，皆在孔門四科設教之系統下，而清代聲音、訓詁、考據之與焉。⁵⁷

7. 康氏在粵講學凡三年，而最先第一年裏，康氏已自限落在經學的深阱中去了。他誤聽了川人廖平的一夕話，他誤以為漢代經學有「今」「古」文兩種絕不同的東西，他遂把一切古文說歸罪於王莽、劉歆之偽造。他以為後世流傳之經學，全是莽、歆古文說，全是「偽經」，只可說是王莽新朝的新學，不能稱他為孔學。他想在這上面入室操戈，摧陷廓清，把東漢以來迄於清代相傳的經學大統，一筆全寫在王莽、劉歆的帳上，然後他再提出一種新鮮的、道地的「新經學」出來，這即是南海康氏之學，而上托於董仲舒乃至《公羊春秋》。⁵⁸

8. 《桂學答問》與《長興學記》後只隔四年，（辛卯至甲申）然而兩書遠異。他說：「天下之所宗師者，孔子也。凡為孔子之學者，皆當學經學。而經學之書汗牛充棟，有窮老涉學不得其門者，則經說亂之，偽文雜之。」如此說來，則孔學仍然是經學，而在經學上又要釐定雜脫，辨別偽文，則豈不仍須走上考據、訓詁的老路。康氏從此說到《公羊春秋》，董仲舒《繁露》，何休《注》，乃至於清儒陳立之《義疏》，劉逢祿之《釋例》，凌曙之《禮疏》諸書，則是仍走上了乾、嘉考據的船頭了。

康氏本以《論語》與《春秋》為孔學之兩途，然自劉逢祿《論語述何》，下及戴望《論語注》，他們都想把《公羊》與《論語》打通，而結果已知此路不通。現在康氏既專主《公羊》，則不得不拋棄《論語》，因而遂並拋棄了宋、明，本來康氏以《公羊》、《穀梁》分歸董仲舒、劉向兩家，把康氏所謂漢學之經世，乃一變而為專講「微言大義」。⁵⁹

僅此數點，康有為的學術思想已勾勒泰半。錢穆之述，旨趣明確，三兩言語，康氏思想已躍躍而出，所謂萬山巒層，得其主峰，錢氏言學之中肯綮者，足資法式。

⁵⁷ 錢穆《學籥》頁104。

⁵⁸ 同上，頁105-106。

⁵⁹ 同上，頁107。

(三) 梁啟超

錢穆說：

1. 追隨康門，從事於新讀書運動的，最著者為梁啟超。梁氏生於清同治十二(1873)癸酉，距今只六十多年；卒於民國十七(1928)年，距今還不到十年；他還是一個嶄新的現代人物。⁶⁰

2. 康有為講學桂林，自著《桂學答問》外，又囑附梁氏為《讀書分月課程》，時梁氏年二十二。⁶¹

今將其《讀書次第表》中六月分配之大概介紹如次：

六月中讀書共分經學、史學、子學、理學、西學五項，內以經學為主。

一、經學：專舉《春秋》與禮學。其六月之分配，如次：

第一月：先讀《公羊釋例》(劉逢祿著)。擇其要者數篇先讀，一二日可卒。再讀其他諸篇，六七八日可卒。

次讀《公羊傳注》(何休注)。共為書班，十日可卒。再讀《春秋繁露》，先擇其言《春秋》之義者，五日可卒。

第二月：可以半月之功，再溫《公羊傳注》、《繁露》二書。次，並讀《穀梁傳》與《王制》。

第三月：讀《新學偽經考》(康著)，《左氏春秋考證》(劉逢祿著)，《禮經通論》(邵懿辰著)，《詩古微》(魏源著)。

第四月：讀《五經異義》、《白虎通》。

第五月：讀《禮記》。

第六月：讀《大戴禮記》及《春秋繁露》中言陰陽天人者。

二、史學：六月中分讀《史記》、《前、後漢書》。

三、子學：六月中凡讀《孟》、《荀》、《管》、《墨》、《老》、《莊》、《列》、《呂》、《淮南》諸家。

四、理學：六月中凡讀宋、元、明三朝《學案》，及《朱子語類》。

五、西學：自第三月起，四個月中讀《瀛寰志略》，《萬國史記》，《列國歲記》，《政要》，《談天》，《地學淺識》諸書。

這樣的讀書，要在前後六月之間，古今中外無不知，微言大敝無不曉，至少易犯兩種流弊：一是意思迫促，不能有沈潛深細之樂，近於太要討便宜。二是自視過高，看外面事理太輕率，易於長成一種傲慢與輕率的態度，不肯虛心玩索。

⁶²

3. 在康氏遊桂後三年，梁氏在湖南與譚嗣同諸人創南學會。其時宛平徐仁鑄為督學，梁氏主講時務學堂，徐氏有《輶軒今語》一書，據說出梁氏手。所謂

⁶⁰ 錢穆《學籥》頁 111。

⁶¹ 同上，頁 111。

⁶² 同上，112-114。

《輶軒今語》者，針對張之洞《輶軒語》而名，謂此無非欲士急究當務，挽濟時艱。其書尚在張之洞《勸學篇》成書前一年。張之洞所以從《書目答問》轉到《勸學篇》，自然亦受此書影響。

一、經學

經學當求微言大義，勿為考據訓詁所困。（西漢主微言大義，東漢主名物訓詁。）
經學當口說、傳記二者並重。（經學本以通微言大義達於政事為主，不必沾沾於章句訓詁間，此西漢經術所以為美也。）

經學當以通今為主義。

經學當先通《春秋公羊傳》。

《四書》宜留心熟讀。（孔子外王之道在《春秋》，內聖之道在《論語》，朱子特尊《論語》，誠為卓識。）

《爾雅》祇須讀郝氏《義疏》一部，《說文》祇須讀段《注》一部。（古人以此等為小學，近儒窮畢生精力，白首而研之，甚乖於小學之義。）

二、史學

史學以通知歷朝掌故沿革得失為主，不可徒觀治亂興亡之跡。

史學以官制、學派二端為最要。（官制為一朝政治之所出，學派為一朝人才之所出，二者皆治亂興衰之大原也。）

史學以民間風俗為要義。

《史記》乃一家之言，不可徒作史讀。

《史記》、《後漢書》宜先讀。

史公以後，以鄭夾漈為史才之最。

《九通》當擇讀。

近儒史學考訂之書，悉宜屏絕。（梁玉繩、王鳴聖輩，雜引筆記，旁搜金石，訂年月，校人名，雕蟲小技，壯夫不為。）

三、諸子學

諸子之學，可與《六經》相輔而行。

漢以後無子書。（漢後號稱子書者，皆可不讀。）

四、宋學

宋學為立身根本，不可不講。（學者苟志趣不立，行誼不端，雖讀書萬卷，只益其為小人之具而已。）

宋學宜先讀《學案》。

朱子書宜先讀《語類》。

諸儒文集宜擇讀。

此雖寥寥十數條，然經學主以微言大義通今致用，史學主掌故沿革，以推籀政治人才興衰之大原，以諸子至《六經》相輔，以宋學為立身基本，皆不失為一種粗大而有氣力的見解。⁶³（錢穆《學籀》頁115-116）

⁶³ 錢穆《學籀》頁112-114

4. 《國學入門書要及其讀法》，乃接著胡適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而寫成，事在民國十二年四月。…全《目》共有書一百六十餘種，分五類：

甲、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

丙、韻文書類。

丁、小學書及文法書類。

戊、隨時涉覽書類。

我覺得他把修養、應用及思想史一類書放第一，而以政治史及其他文獻一類書放第二，實在還是以前萬木草堂、長興學舍舊規模。但他並不以孔子為教主，《公羊春秋》為教典。全部《書目》中，再沒有何休《公羊傳注》以及劉逢祿《公羊釋例》乃至《穀梁傳》，《王制》，《五經異議》，《白虎通》，《左氏春秋考證》，《新學偽經考》等等，今文學家張皇附會的附籍。…這是梁氏擺脫康氏束縛，自出手眼的一個絕大進步。⁶⁴

5. 我看梁氏《書目及其讀法》，還不失為指導現在青年的一個良好的方案，其間亦不免有小小可商處。如文學排去散文專集而專取韻文。（《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內卻有唐宋韓、歐諸家），自有文學上絕大絕高之價值，縱不必勸人學古文，然學古文，至少亦自有陶寫情趣之用。《論語》勸人讀戴望《注》。戴《注》牽強附會，此梁氏仍未脫以前公羊家觀點也。又如《易經》勸人讀焦氏書。焦書屬一家之言，卻不必在此《書目》中勸讀，此仍是未脫乾、嘉以來之門面語。如此之類，然不足為此目錄之全體病。⁶⁵

則梁氏所舉讀目錄，確為浩瀚而無當，非才氣縱恆且兀兀窮年者，實未足以擔之，亦見梁氏精力與智慧之過人。

綜上之述，則由陳澧而曾國藩，由曾國藩而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乃至朱子、孔子，其學其問，皆儒者氣象，亦皆昭示後人，學而後知，知而後用，最後由內聖的立意，至於外王的延展，此雖非人人能至，然有心於學於問者，尤宜藉前聖前賢為學的慧識，而焚膏繼晷，期能踵武先哲腳步，於傳統治學之途亦有進益，此蓋往聖昔賢之意，亦錢穆《學籥》一書的精要。

主要參考書目

錢穆 2000《學籥》台北：蘭臺出版社

錢穆 2000《中國現代學術論衡》台北：蘭臺出版社

錢穆 1976《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錢穆 1976《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台北：聯經出版社

⁶⁴ 錢穆《學籥》頁 120。

⁶⁵ 同上，頁 127

- 錢穆 2002《朱子學提綱》北京：新華書店
- 錢穆 1986《晚學盲言》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汪學群 1998《錢穆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陳澧 1971《東塾雜俎·讀書記》台北：文海出版社
- 陳澧 1971《東塾續集》。台北：文海出版社
-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求闕齋讀書錄》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光緒二年丙子冬、傳忠書局刻
- 趙增暉 1975《曾國藩言行體系》台北：蘭溪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 張之洞 1997《書目答問》香港：三聯書店
- 梁啟超 1995《中國近三百年術史》台北：里仁書局
- 梁啟超 1999《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北京：商務印書館
- 陳鵬鳴 1999《梁啟超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皮錫瑞 1987《經學歷史》台北：藝文出版社
- 王念孫 2000《廣雅疏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胡楚生 1993《清代術史研究》台北：學生書局
- 胡楚生 1994《清代學術史研究續編》台北：學生書局
- 戴震 1974《戴震文集》台北：華正書局
- 余英時 1995《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出版社
- 余英時等 1992《中國哲學思想·清代篇》台北：水牛出版社
- 戴君仁 1974《梅園論學續集》台北：藝文出版社
- 戴君仁 1979《梅園論學三集》台北：學生書局
- 胡適 1986《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台北：遠流出版社
- 夏承燾、繆鉞等 1983《與青年朋友談治學》北京：中華書局
- 嚴郁文 1990《清儒列傳》台北：商務印書館
- 羅聯添等 1987《國學論文精選》台北：國立編譯館